伊朗高层不抱幻想，万斯直言失利根源，民主党提结束战事

特朗普不后悔对伊开战

■本报记者 刘畅



伊朗将11月4日定为“反对全球傲慢日”，每年在这一天都要举行反美集会。当天，伊朗民众手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肖像参加集会。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11月4日，伊朗多地民众举行大规模反美集会，纪念1979年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事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国会力量对比变化抱有一丝希望，不会通过对美国让步换取其改变对伊政策。

近日，美国方面正不断发出威胁，扬言要重启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的防御准备处于最高级别，同时美伊仍通过调解人进行谈判。分析认为，边谈边放狠话，说明伊朗在保持威慑的同时极力维护谈判筹码。

穆杰塔巴强硬表态

据悉，此次集会在首都德黑兰及全国数百个城镇同步举行，参与者包括各界民众、政府官员及军事指挥官。当天上午9时，德黑兰的示威队伍从巴勒斯坦广场出发，一路行进至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旧址，沿途播放悼词和颂歌。示威者挥舞伊朗国旗，手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多名高级军事指挥官、政府官员及遇难平民的照片，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

1979年11月4日，支持伊斯兰革命的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把52名使馆人员扣为人质。此后伊朗官方将11月4日定为“反对全球傲慢日”，每年在这一天都要举行反美集会。当天，穆杰塔巴发表致辞表示，如果仍有人对美国会因国会力量对比变化而改变其霸权行为抱有一丝希望，又或者认为通过对美国让步就能令其改变敌视伊朗的政策，那就是大错特错。

他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打击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等行动，是对美国侵略行径的回应。如果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的规模将大幅扩大。他还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仅标志着美国不可战胜神话的破灭，也暴露出依赖外部力量的政府自身的软弱”。

与此同时，多个地区国家仍继续推动伊朗战事外交解决，尽管距离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仍很遥远，但斡旋方尽力缩短双方之间的分歧。

对此，**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研究员舒梦**对本报表示，不抱有幻想和保持谈判并不冲突。不抱幻想是伊朗对于美国战略目标和底线的基本判断，不管政局如何变化，美国都不太可能放弃对伊朗持续施压。不抱幻想就是失去对美国的基本政治信任。

而谈判是伊朗的策略工具之一，伊朗需要通过谈判来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空间，一方面为霍尔木兹海峡、停火、制裁等事项争取最大程度的利益交换，另一方面也是向国际社会展示出愿意沟通协商的姿态。

万斯与特朗普做切割

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大获全胜，重获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控制权。特朗普4日承认，伊朗战事影响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的表现。

当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发表长文，剖析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的原因，直言伊朗战事是根源所在。美国媒体解读称，万斯对特朗普“不加掩饰的批评”是与特朗普做切割，并开始为参加2028年总统竞选布局。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回应称，“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因为它（伊朗战事）在短期内推高了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认为，发动伊朗战事仍然“值得”。他表示：“如果让我重新来过，我还是会这么做……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4日则表示，伊朗战事“必须结束”，民主党人将结束这场战事。他还称，已经有一些共和党人加入结束伊朗战事的行列。他表示，国会掌握着联邦政府的“钱袋子”，这是“阻止总统未经美国人民同意发动战争的手段之一”。

舒梦认为，无论哪个政党掌控国会，美国对伊朗的整体战略目标尚未发生变化，即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防止针对美军及其盟友的袭击，这类基本政策框架不会随中期选举结果发生根本转变。

真正可能发生变化的是白宫未来推行对伊政策可能会面临更加高昂的国内政治成本，新的国会会对白宫政策形成更多制约。舒梦表示，中期选举本身并不等同于反战公投，选民的不满并非单纯针对伊朗开战，而是冲突持续给美国国内带来的各类成本和代价，地区冲突不会因为中期选举结果戛然而止。

解决库尔德问题考验土耳其政治包容度

专家视点

■杜东辉

土耳其议员1日证实，被土政府监禁的库尔德工人党（库工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已被转移至一处新建监舍。亲库尔德人的议会政党呼吁土政府以此为契机，加速推进与库工党的和解进程。

其实，自2024年10月土耳其执政联盟向库尔德政治力量释放破冰信号以来，这场官方称为“无恐怖主义土耳其”、旨在终结政府与库工党四十二年流血冲突的和解进程已经推进两年有余。从在押的厄贾兰号召弃武，到库工党宣布解散，再到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框架法案，和解进程取得历史性突破。然而，随着重心转向政治善后，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多重因素逼库工党弃武

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政治力量的和解，源于国内政局与地区环境的双重驱动。国内层面，在2024年3月地方选举中，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借库尔德选民支持赢得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主要城市，动摇了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的执政优势。与此同时，土总统埃尔多安力推在2028年大选前制定新宪法，而执政联盟在议会600席中仅占316席，未达到将修宪案提交全民公投所需的360票。因此，争取拥有57席的亲库尔德政党的支持，成为推动和解进程的重要政治考量。

作为跨界民族问题，库尔德问题的演进与周边地缘格局休戚相关。2024年3月，在土耳其的推动下，伊拉克正式将库工党列为“被禁止组织”，大幅收紧了其生存空间；在叙利亚方向，随着亲土过渡政府掌权，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空间急剧萎缩。加之美国逐步放弃对叙库尔德武装的扶持，库尔德力量作为大国地缘筹码的价值显著贬损，客观上倒逼库工党走上弃武和解之路。

对库工党而言，接受和解也是长期军事压力下的现实选择。近年来，土耳其依托国产无人机、电子情报系统和前沿基地，持续压缩库工党的活动空间，大幅削弱其山地游击战能力。在此背景下，厄贾兰于2025年2月提出的“和平与民主社会”倡议，为该党从武装斗争转向政治参与提供了方向。

弃武作为后续安排前提

与正发党政府主导的“第一次和平进程”不同，本轮和解由执政联盟中的民族行动党主席巴赫切利率先提出。这位向来对库工党态度强硬的政治人物提议，若厄贾兰公开呼吁解散组织并放弃武装，可允许其向议会党团发言，并为其获得推动解除武装的法律角色留下空间。这一安排既降低了正发党调整政策的政治成本，也确立了本轮和解的基本路径：不进行对等谈判，而是以先行解除武装作为后续政治安排的前提。

在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协调下，2024年12月，亲库尔德的人民平等与民主党议员获准登岛探视厄贾兰，重启了中断近十年的政治沟通渠道。2025年2月27日，厄贾兰发表书面声明，指出武装斗争模式已过时，要求库工党召开代表大会并自行解散。5月，库工党在伊北部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决定解散组织架构。

在库工党实质性弃武基础上，今年8月10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加强民族团结与社会融合法》。该法案允许对未参与暴力犯罪的库工党成员暂缓起诉或暂缓执行刑罚，为其重返社会提供了法律框架。8月下旬，由副总统耶尔马兹牵头，外长费丹、防长居莱尔及情报局长卡林等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下设四个工作组推进落实，标志着和解转入制度化运作阶段。

和平下半场问题更棘手

今年8月，框架法案通过后，和解进程并未全面铺开，反而一度陷入技术性停滞。究其原因，在于双方对和解性质的认知存在偏差。土耳其政府旨在消除恐怖主义威胁，8月的立法仅是一部聚焦安全受降与人员遣散的治安法案，全文甚至未提及“库尔德”一词。而库尔德政治力量则将弃武视为换取民主权利的契机，而恢复地方民选治理、改革《反恐法》及保障族裔文化与语言权利等议题，至今未被纳入立法议程。

跨境分支的处置构成了另一重掣肘。土方要求库工党在叙利亚和伊朗的衍生组织一并弃武，尽管叙利亚民主力量已于今年8月宣布完成整编，但伊朗分支“库尔德自由生活党”仍拒绝缴械。鉴于新法实施须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所有关联组织彻底弃武为前提，伊朗分支问题可能制约法案落地。

纵观和解进程，双方已跨越多个关键门槛，为终结持续四十余年的流血冲突带来了契机。但解除武装只是结束冲突的必要条件，并不意味着问题随之解决。如何回应库尔德群体在语言文化、地方治理与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诉求，更考验土耳其的政治包容度。和平下半场面临的问题，比前期更为复杂棘手。

（作者系上海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研究员）

“碾压”之后，年轻人的无力感得以消解

地球村即景

■本报记者 余润坤

英国《柯林斯英语词典》3日宣布，网络词汇“碾压”（mogging）当选今年年度词汇。这或许是一个多数中国人尚未听说的英文单词。官方给出的释义是在容貌、气场、状态等维度上明显压过他人，让被压过的一方显得黯淡无光。语料库数据显示，这个词在过去一年里的使用频率迅速攀升，增幅达到210%，其使用者集中在Z世代和更年轻的α世代群体。

一直以来，各大机构的年度词汇评选都被视作一次社会情绪的抽样调查，而“碾压”所折射出的，是当代年轻人微妙而复杂的心理。他们一边在社交媒体上熟练地运用着这个词来调侃、自嘲，一边无形中参与着一场规模空前的比较游戏。

从健身房走出的俚语

mogging的词根可以追溯到AMOG这个缩写，全称是alpha male of the group，意指群体中最具支配地位的雄性。这个缩写最初出现在十年前的健身健美爱好者社群中，专门形容健身房里那些体格极为突出的健身者。随后这个词逐渐动词化，衍生出了mog和mogging的形式，并且在一些以男性气质讨论为核心的网络论坛中流行开来。

这些论坛中的一部分内容涉及极端的外貌优化主义，主张通过整容、健身、仪态训练等手段最大化个人的外貌吸引力。在这个语境下，“碾压”被用来描述一种基于外貌和体格的比较行为，有着明显的竞争和等级意味。

“碾压”的流行，关键在于它的语义已经远远跳出了最初用来比较外貌的范畴。如今的年轻人几乎可以用“碾压”来形容任何场景。青少年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某位顶尖运动员在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游戏玩家可以用它来形容一款新发布的游戏在画面或玩法上全面超越旧作，烘焙爱好者甚至会用它来形容朋友烤出的面包在品相和口感上战胜了自己的业余作品。

这种语义的泛化过程伴随着语气上的软化。主流用法中的“碾压”已经褪去了最初的攻击性，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朋友间的戏谑调侃，并带有些许坦然的自嘲意味。当一个人说自己被“碾压”的时候，往往并非真的感到受到了冒犯，而是在承认差距的同时，用幽默的方式消解了攀比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流行背后的社会心理

词汇的走红背后必然存在着某种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碾压”的流行与当代社交媒体所塑造的比较文化密不可分。互联网上充斥着精心修饰过的面孔、身材和生活片段，算法推送机制又不断地将用户与那些最优秀、最耀眼的样本进行比较，普通人在这种持续的高强度对比中很容易产生一种被碾压的无力感。

“碾压”一词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为这种无力感提供了宣泄的出口。当一个人说出我被“碾压”了的时候，原本可能引发焦虑的比较经历，就已经被转化为一种可被一笑置之的社交货币。这种将负面体验幽默化的语言策略，是年轻人应对社会压力的常见方式，类似的语言现象在过去几年的年度词汇评选中也反复出现。

尽管主流用法中的“碾压”已经呈现出轻松化倾向，但与其所关联的攀比现象仍然值得警惕。心理健康领域的专家指出，“碾压”与极端外貌优化主义的关联，可能会对部分年轻人的自尊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当一个人频繁地将自己与那些在容貌、体格、成就上远超自己的对象进行比较时，这种比较行为就可能加剧焦虑和自我怀疑的情绪，尤其是对于正处在自我认同形成关键期的青少年群体。

此外，“碾压”所隐含的比较逻辑，也可能无形中强化一种以竞争和等级为优先的价值观，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碾压与被碾压的博弈。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主流语境中的“碾压”已经与它的原始语境产生了足够的语义距离，将其视为一种无害的调侃更为合理，过度解读反而低估了年轻人在语言上的自觉性和辨别力。

年度词汇的评选每年都会引发讨论，有人觉得这是语言具有活力的体现，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又一场短暂狂欢。但无论持有何种观点，从“碾压”的走红我们都可以看出，攀比现象对于当代年轻人精神生活的渗透之深。而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与这种现象共存，他们创造了新的词汇来描述它，用玩笑来消解它，用自嘲来接纳它。

失去国会支持，白宫还有什么牌？

国际观察

■辛格 孟维瞻

过去，美国中期选举虽关系国会控制权，在美国以外却很少获得与总统选举相近的关注。近年美国党争加剧，中期选举才逐渐具有近似大选的热度。2026年的结果尤其引人注目。一个失去国会两院支持、但仍掌握行政权的总统，将如何度过任期最后两年？本次选举对2028年大选将会有什么影响？

民主党控制两院

美东时间3日18时起，全美范围内投票陆续结束。数小时后，舆论此前预判的“蓝潮”（蓝色和红色分别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代表色）逐渐显现，民主党候选人在各地接连赢得选举。至午夜，多家主流媒体预测，民主党锁定参众两院控制权。

在众议院，此次选举改选全部435个议席。最新预测结果显示，民主党预计最终将拿到超过245个席位。在竞争激烈的宾夕法尼亚、艾奥瓦、肯塔基等关键州的多个选区，民主党人都击败共和党对手。而这些选区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都是特朗普的票仓。

在参议院，本次选举改选100个席位中的35个，民主党需增加4席才能成为多数党。此前预测认为，两党选情胶着，结果难料。但“恶斗”并未上演，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赢下得克萨斯、俄亥俄、缅因、艾奥瓦、堪萨斯、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等7个州。目前，民主党预计在参议院把控至少54席，成为参议院多数党。

值得注意的是，在参议院选举中，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詹姆斯·塔拉里科击败共和党对手胜出，这是民主党1988年以来首次在该州赢得参议院席位；在堪萨斯州，民主党人亚当·汉密尔顿击败现任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杰·马歇尔当选，成为自1932年以来首名在该州赢得参议院席位的民主党人。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州的“由红转蓝”足见选民对共和党深度不满。

共和党因何失利

执政党失去众议院是美国中期选举的常见结果，但共和党这次连参议院也失守，且在若干原本安全的州丢掉席位，败因就不能仅归结为历史惯性。2024年，特朗普争取选民时强调压低生活成本、恢复制造业，并承诺避免美国陷入新的战争。两年过去，美国普通家庭仍为住房、食品、能源和医疗支付高昂代价。高关税及其引起的贸易摩擦，使选民更难信服控制物价的承诺，伊朗战事则进一步损害了他避免战争的政治形象。

有民调显示，约四分之三的选民对美国政治走向感到愤怒或不满，约六成认为高物价更多应归因于特朗普的政策，约七成希望国会对总统形成更有效的制约。这些回答说明，投票是对过去两年生活经验与政府行为的总体评价。特朗普可以说自己“不在选票”上，却无法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忘记白宫的政策。政府强调宏观指标改善，民众却感到自己在购物、加油站和房租上压力持续增大，两者之间的落差是共和党此次遭遇选票惩罚的深层原因。

还有两层原因。其一，特朗普于2024年扩大的选民联盟没有稳定下来。部分年轻人、拉美裔及独立选民当年相信他能够改善生活，如今对兑现程度不满，选票便重新流向民主党。他们未必认同民主党的全部主张，也可能只是希望有人约束行政当局，使总统在事关家庭开支和战争的决定上多听取不同意见。其二，共和党候选人承担了过度依赖总统个人声望的代价。特朗普能够吸引一些并非传统共和党的选民，这些选民未必会把支持自动转移给他提名的国会议员。部分候选人的争议、党内初选留下的裂痕，又扩大了这种落差。

选区重划也未能替共和党筑起可靠屏障。把支持者从优势极大的选区分散到邻近选区，理论上能增加胜算，但当全州民意同时向另一党移动，原本设计为微弱优势的多个选区便可能一起失守。这就是“杰利蝾螈”的反噬效应。艾奥瓦等地出现的成片翻转，就是典型案例。更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还赢下若干州的参议院席位，很多候选人甚至都没有预料自己可以当选。众参两院同时转向，才使这次败选具有全国性政治意义。

特朗普怎么应对

新一届国会明年1月就任后，特朗普推动大规模减税、改变社会支出或以立法扩大行政权，都需要面对民主党制约。众议院能够举行听证，并审查政府预算；参议院能够拒绝争议较大的部长、驻外使节与联邦法官人选。那些过去可以交给本党国会多数处理的问题，将逐项变成谈判。每年的拨款尤其容易成为冲突焦点。民主党可以要求政府说明资金用途，尝试限制争议项目继续获得经费，特朗普则可以用否决权反击，政府停摆风险由此上升。

多数党可以调查总统及高级官员，也可能推进弹劾。众议院通过弹劾条款后，参议院定罪仍需出席议员三分之二赞成。调查更可能迫使政府公开决策依据，拖慢争议人事任命，并要求官员解释各种有争议的政策。总统能否维持官员队伍稳定，也将影响各部门政策落实。提名受阻时，白宫可能更多依赖现职官员或临时代理，却很难使长期任职的争议人选绕过参议院审查。

另一方面，总统依然掌握行政部门，可以在现行法律许可范围内决定执法、外交及政策执行的轻重缓急，也保有否决国会法案的权力。民主党没有凭简单多数推翻总统否决的能力。在对外经贸安排方面，国会将会不断质询并尝试附加限制，白宫仍主导谈判与具体执行。双方都能制造障碍，却很难单独完成整套政策。特朗普的后半任期仍有较大行政施政空间，府会冲突会使重要决定面临更长的谈判过程。

未来两年的博弈

府会分立通常使总统更需要协商，也可能诱使一位不愿让步的总统更加依赖行政手段。未来两年，白宫若调整关税和预算主张，减少对外军事冒险，把精力放回民生与产业，两党仍能在有限领域达成协议。民主党也必须提出可行的治理方案，只会调查和否决最终也会导致选民的不满。民主党已经控制了众议院多数，委员会调查将会持续推进，但立法仍须面对总统否决以及党内不同派别对拨款和贸易问题的分歧。

另一条道路更危险。若总统将国会阻挠一概视为对个人权威的挑战，频繁诉诸紧急权力，要求行政机关绕开拨款限制，或拒绝落实法院裁决，普通的府会争执就可能演变为宪制冲突。风险还在于执行命令的官员是否认定自己首先服从法律，以及州政府、法院和国会能否在压力下维持各自职责。

最近几年部分国家出现了宪政危机。韩国2024年的戒严风波表明，当总统试图借紧急权力限制议会活动，制度能否抵御冲击，要看议员能否行使职权以及军警如何执行命令。波兰最近围绕宪法法院法官任命和法院领导权的冲突，则表明相互否认合法性可能使司法程序成为政治争夺的一部分。美国与两国的宪制设计不同，却同样面临一个严肃问题，当党派竞争愈演愈烈的时候，某一方就可能会试图突破宪政边界，寻求政治冒险。

从美国既有争议看，紧急权力和行政机构的人事安排尤其值得持续观察。白宫可以提出扩大行政行动范围的法律解释，国会则能通过听证和拨款追问依据。真正严峻的情形是，行政机关在法院作出相反裁定后仍保持原有做法，随后又把国会监督描述为对国家安全的妨碍。每一次争执单独看来或许都有法律程序可走，但许多程序同时失效，宪政危机就会加深。更需警惕的是总统在未来两年借危机扩大权力，持续挑战法院与国会的明确决定，甚至干预2028年的选举和权力交接。如果这种事越来越多，制度边界就可能逐步丧失。

美国联邦制给州政府留下了自主空间，军队和联邦执法机构也有各自的法律约束，这些都增加了总统单方面改写政治秩序的难度。但制度是否有效，还要看任职者如何行动，总统完全有可能以模糊的方式挑战宪政边界。宪政危机更可能表现为一道命令、一项拨款和一份久拖不决的判决，行政部门借时间差维持既成事实而加剧矛盾。

1994年，共和党在众议院净增54席，最终以230席对民主党204席取得多数，同时夺得参议院，但克林顿仍在1996年赢得连任。2010年，共和党在众议院净增64席，以242席对民主党193席取得多数，但奥巴马也在2012年获得连任。两次经历说明，中期选举的严重失利能够惩罚总统，却不自动决定下一届大选结果。经济状况、执政者的应变与对手能否提出令人信服的政策，仍会改变两年后民众的判断。

这两个历史案例的另一层启示在于，当时的总统在失败后作出了比较正确的政策选择。妥协和反思是必要的。他们并未消除党派对立，却在下一次大选时重新争取到了足够的选民支持。1994年，克林顿面对的同样是共和党控制两院，但当时美国经济状况较好，而现在美国面临的经济囧境，很难得到真正解决。

克林顿与奥巴马的经历也给共和党留下一种可能。特朗普若在失利后调整政策，将经济成果重新放到优先位置，共和党候选人仍可能在2028年获胜。如果不进行彻底反思，共和党很难重新赢回此次流失的选民。政策转向无法抹去败选，却能决定下一位共和党候选人是否仍要为旧的承诺埋单。

（作者分别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